**苏铂烨：国家与革命讨论**

1.文中写道，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更容易，所以国家机器有削弱的趋势。但在中国建国初期，国家机构似乎更强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讨论：①文中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占少数，但是在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不占绝对优势。

②苏联的克格勃也是国家机构增强的表现，但是其一，关于克格勃的历史真相我们并不了解，网络段子不能作为依据；其二，苏联的无产阶级人数比例比发达国家低。

③国家机构增强可能是为了改造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

④建国初期国家机器并不那么强大，还比较宽松，表现是：党中央开会时对一件事先进行讨论，得到一致结论后再执行，即使是毛主席也有因观点不能得到大家同意而郁闷的时候。

⑤如何比较国家机构强弱：统计公务员数量不合适，应主要统计暴力机关，如监狱、警察、法院等，另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是在押人数占总人口比例。

2.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

讨论：①对应“工分”时期。有一小批人不进入工分体系，如军属，凭身份直接获取工分；工分体系不完善，出工不出力。但是工分主要适用农村，城市还是工资制。干部之前是供给制，之后改为工资制。

②现在的国企里，奖金、绩效工资等，领导更容易获取。但是奖金和绩效工资不算按劳分配，而是按生产要素分配。

**刘圣沿：《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讨论**

1.公社和国企的相似性？

讨论认为，公社和国企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不一样的，这样的比较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2.相关历史背景知识（需参考有关史料，以下只列出讨论内容）

农奴制时代农奴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俄国改革废除农奴制，农民成为自由人，但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民想要获得土地只能通过赎买，但是农民资金不足，只能通过借贷、服徭役等形式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这些东西成为农民新的负担。

村社是历史遗物：农奴时期地主会组织农奴进行劳动、收租、服徭役，农民自己也会自发组织村社，功能相同。

3.本篇的意义在于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边界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西欧和俄国有不同的分析，因为二者的社会背景、环境、历史都有很大不同。从农业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列宁领导俄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张世轩鼓励大家了解、吸收一些其他国际共运的斗争经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的具体运用

**张靖宇**

我们一提到共产主义，就会有像“生产力高度发展”“按需分配”这样的词语跑入我们的脑海，看起来非常美好，但是有些遥远。但事实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详细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即它是怎么从我们熟悉的现实一步步走向理想中的美好世界的。同时，在该文中也详细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尤其是国家会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消亡这一观点。

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里出现了几例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是“专政”竟能带来“民主”，二是理论上，当今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发展到“人人平等”的地步了，还有“更民主”吗。是的，在法律上，宪法规定了每个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英美等国，更是有“一人一票”的特色民主，看似每个人甚至能决定国家首脑的任免。然而，这种看似一视同仁的民主却对穷人是极不友好，或者说极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首先体现在花销上，无论是议员竞选还是总统竞选都是极度烧钱的事业，普通人很难负担起竞选的开销，因此，在美国议员中富豪比例极高，据网络查询所得，国会议员中百万富翁占比大致为50%，而在全美范围看，这一比例仅为1%。从情感上，我们很难相信平均财富如此之多的议员会一心为平均收入远低于他们的普通民众着想。事实上，华盛顿，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模式广遭议论，奥斯卡获奖记录片《监守自盗》展现了这一问题。

所以，马克思才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给广大的人民带来民主。毫无疑问，被专政的少部分人是享受不到民主的，但这却是大多数人获得民主的必要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镇压人民的职能。而在过渡时期，国家便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镇压资产阶级的职能。值得指出的是，因为资产阶级是少数，所以为了执行镇压职能，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机器必然十分强大，而到了过渡阶段，镇压小部分资产阶级的难度大大减轻，所以国家机器有削弱的趋势。

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经济上的公有制也随之确立然而，正因为现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无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人民的思想觉悟都没有达到较高的境界，此时尚不能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这里实行的是严格的按劳分配制度。社会成员贡献自己的劳动，并领取证明劳动的凭证，然后凭凭证领取相应的产品。这也是对所谓“公有制不能刺激积极性“一说的回应，因为，劳动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与分配制度挂钩，而按劳分配必然会鼓励劳动，这与所有制并没有关系。

不过，这种按劳分配的准则依然是带有资产阶级特色的准则，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共产主义因现实原因对资本主义的妥协而已。这是因为，首先，人们劳动还是为了获得产品。其次，在按劳分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劳动种类收益的不同，例如脑力劳动可能在与体力劳动相同时间的情况下折算更多社会劳动凭证，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一种不平等。

在这一阶段，随着所有制的改变，阶级消失了，国家的镇压职能也自然消亡了。此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按劳分配“这一基本社会准则的实施。国家的职能进一步缩减。

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在物质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充分涌流，使得按需分配替代按劳分配获得物质基础。而在精神上，人们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长期生活使得他们习惯了公共生活的一些基本准则。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们能够跳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尽其所能地来劳动。这也是按需分配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也许有人会说在按需分配的情况下没人会努力工作，即使通过种种先进科技例如人工智能使得物质生产达到了按需分配的水平，这个社会却已经死了。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劳动本身，便会发现劳动可以成为人的自发需求。在商品社会以前，劳动具有两重性，物质上，劳动满足劳动者的客观需求，例如我想要个椅子，便自己劈柴做个椅子。精神上，充分发扬个人创造力的劳动能带来一种愉悦感。可是，在商品社会，劳动被扭曲了，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许多工作只剩下重复机械的劳动，并不需要创造力，只会给人的精神带来痛苦。所以，在商品社会，劳动才是如此痛苦，人们只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才劳动，看起来按需分配会直接导致劳动消失。但是，当生产力高度发达时，我们有理由相信重复机械的劳动已经由机械代劳，人类可以更多进行有创造性的劳动，这样，劳动就不会成为痛苦，反而成为个人价值的实现

在这个阶段，国家连维持基本社会规范的作用也没有了，因为这些规范已经深入人心，会被人们自发地遵守，自发的监督，而不需要一个特别设立的公权力。国家走向消亡。

这也就是我们所通常认识的共产主义。